

《旧唐书·西戎传》“泥婆罗国” 史料来源考略

蔺周智 蓝田县孟村乡民生希望初级中学 陕西 蓝田 710521

摘要：“泥婆罗国”（又作尼婆罗国）的情况在传世的几种文献中都有记载，如最早反映西域及古印度各国情况的域外地理著作《大唐西域记》，以及成书于唐高宗总章元年（公元668）的佛教文献汇编性质的《法苑珠林》，及杜佑的《通典》，断代体政书类的《唐会要》，这些基本上都是成书于唐代的文献。当然在五代和北宋初年撰成的文献资料中也有记载，如《旧唐书》、《太平御览》、《太平寰宇记》等。今就以上文献中所见关于“泥婆罗国”的史料记载，来考述《旧唐书·西戎传》“泥婆罗国”的史料来源问题。

关键词：尼婆罗国，史料，来源，考略

[中图分类号]: K242 [文献标识码]: A [文章编号]: 1002-2139(2011)-09-0099-02

《旧唐书·西戎传》“泥婆罗国”的记载情况不见于《隋书·西域传》，说明其国的情况在唐初时人们还不是十分了解，故在编修《隋书·西域传》时不为其国作传。至贞观年间，大唐高僧玄奘出使印度取回佛教经典。回国后由其口述经历，弟子辩机记录，撰成《大唐西域记》。其详细地记载了西域及古印度各国的情况，成为中西交通史上的名作，其所述的域外地理知识，无论是其广度还是深度，在中国历史上都已达到空前的水平。“尼婆罗国”首次出现在其著作中。然而《大唐西域记》对其国的记载失之简略，使人们不能了解其国的详细情况。引其文如下：

“泥婆罗国周四千余里，在雪山中，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，山川连属。宜谷稼，多花果，出赤铜、犍牛、命命鸟，货用赤铜钱。气序寒烈，风俗险波。人性刚犷，信义轻薄。无学艺，有工巧。行貌丑弊，邪正兼信。伽蓝、天祠接堵连隅。僧徒二千余人，大小二乘，兼功综习，外道异学，其数不祥。”

“（小水池）都城东南有小水池，以人火投之，水即焰起，更投余物，亦变为火。”^{〔1〕}

其内容之所以记载如此之简略，是因为玄奘并未实际经过其国，据《慈恩传》玄奘到吠舍釐巡礼之后，即“南渡旃伽河至摩揭拖国”未提及尼婆罗国，对其国内容的记载可能是由其他国人口述而得知的，因此上记载较为简略。其国的内容在《旧唐书·西戎传》有较为详细的记载，其文为：

“泥婆罗国，在吐蕃西。其俗翦发与眉齐，穿耳，揜以竹桶牛角，缀至肩者以为姣丽。食用手，无匕箸。其器皆铜。多商贾，少田作。以铜为钱，面文为人，背文为马牛，不穿孔。衣服以一幅布蔽身，日数盥浴。以板为屋，壁皆雕画。俗重博戏，好吹蠡击鼓。颇解推测盈虚，兼通历术。事五天神，镌石为像，每日清水浴神，烹羊而祭。其王那陵提婆，身著真珠、玻璃、车渠、珊瑚、琥珀、瓔珞，耳垂金钩玉钗，佩宝装伏突，坐狮子床，其室内散花燃香。大臣及诸左右并坐于地，持兵数百列侍其侧。宫中有七层之楼，覆以铜瓦，栏槛楹杙皆饰珠宝。楼之四角，各悬铜槽，下有金龙，激水上楼，注于槽中，从龙口而出，状若飞泉。那陵提婆之父，为其叔父所篡，那陵提婆逃难于外，吐蕃因而纳焉，克复其位，遂羁属吐蕃。

贞观中，卫尉丞李义表往使天竺，途经其国，那陵提婆见之，大喜，与义表同出观阿耨婆娑池。周回二十余步，水恒沸，虽流潦暴集，烁石焦金，未尝增减。以物投之，即生烟焰，悬釜而炊，须臾而熟。其后王玄策为天竺所掠，泥婆罗发骑与吐蕃共破天竺有功。永徽二年，其王尸利那陀罗又遣使朝贡。”^{〔2〕}

《旧唐书·西戎传》中所记之文被北宋初年官修的《太平

御览》所直接承袭，对比《旧唐书·西戎传》和《大唐西域记》所记，其记录相去甚远。由此可知，《旧唐书·西戎传》“泥婆罗国”的史料并非来自于《大唐西域记》。但是，其中涉及的有关内容是两者皆有的，如对其国中“水池”的情况的记载，两者虽在文字上有出入，但其所涉及的均为同一“水池”。关于对“水池”的情况在同时期的不同文献中也有类似的记载，如成书于高宗总章元年（公元668）的佛教资料汇编《法苑珠林》，其卷24引《王玄策西国行传》云：

“唐显庆二年（公元657）敕使王玄策等往西国送袈裟，至尼婆罗国。西南至颇罗度来村，东坎下有一水火池，若将家火照之，其水上即有火焰于水中出。欲灭，以水沃之，其焰转炽。汉使等曾于中架一釜，煮饭得熟。使问彼国王，国王答使人云：‘曾经以杖刺著一金匳，令人挽出，一挽一深。相传云此是弥勒佛当来成道天金冠，火龙防守之，此池火乃是火龙也’”^{〔3〕}

同书的卷38也有记载，其内容为：

“西北行一千五百里入山谷，至尼波罗国，属北印度。都城东南不远，有水火村，东一里许，有阿耨婆娑水，周二十步，旱涝湛然，不流常沸，家火投之，遍迟起火，烟焰数尺，以水洒火，火增更炽。碎土以投，亦即然尽无问投者，并成灰烬。架釜水上，煮熟立食。……”^{〔4〕}

另外在《释迦方志卷上·遗迹篇第四》也有记载：

“又西北千五百里入山谷至尼婆罗国，周千余里，在雪山中。都城二十余里，杂信寺及天寺极多，僧二千余人，大小兼学，住纯信佛。城内有阁高二百余尺，周八十步，上容万人。面别三叠，叠别七层，徘徊四厦，刻以奇异珍宝饰之。城东南不远，有水火村，东一里许，有阿耨婆娑水。周二十步，旱涝湛然，不流常沸，家火投之，遍迟起火，烟焰数尺，以水洒火，火增更炽。碎土以投，亦即然尽。无问投者，并成灰烬。架釜水上，煮熟立食……”^{〔5〕}

对比以上几则来源不同的史料，可以看出，《大唐西域记》所记失之简略，而《法苑珠林》和《释迦方志》有详细的记载，特别是《法苑珠林》卷38和《释迦方志卷上·遗迹篇第四》的文字都是一样的，其很可能是来源于同一史源。

《释迦方志》系继《大唐西域记》之后纂述成书，所记域外地理内容，大致不出《大唐西域记》的范围。作者道宣，也是一位僧侣，曾参与与玄奘主持的译经活动，编纂此书不仅直接受到《大唐西域记》的影响，而且它在地理方面的核心内容主要也是取自《大唐西域记》。由于《大唐西域记》原本“纸墨易繁，阅镜难尽”，普通读者阅读嫌篇帙繁多，故道宣摄其纲要，“略为二卷”。但道宣在撰述过程中还参照了其他许多文献，所以也提供了许多《大唐西域记》没有的域外地理知识，

如从河州入吐蕃，在经尼波罗（今尼泊尔）国入印度的交通路线，就不见于《大唐西域记》。道宣不像玄奘那样对域外地理有实际考察，《释迦方志》只能依据前人的撰述及传闻进行纂述，所以这部著作的意义，更多的是保存了唐初所获得的域外地理知识。因此上《释迦方志卷上·遗迹篇第四》中对“水池”的记载是对《大唐西域记》记载的补充与丰富，其显然是吸收了其他域外地理著作中的内容。要么便是对当时《大唐西域记》内容的承袭，但是现存的《大唐西域记》中无此详细的记载，是不是可以将其看做是今本《大唐西域记》的逸文？如果其吸收了其他域外地理著作中的内容，那么其极有可能是已经妄逸的王玄策所著的《中天竺国行记》。其书在两唐书的经籍志与艺文志中均有著录，但是宋代以后不见著录。但其书的有关内容散见于有关的佛教著作中，如《释迦方志》、《法苑珠林》、《一切经音义》等。如《法苑珠林》卷24和卷28所引的内容就是王玄策的《中天竺国行记》。（《王玄策西国行传》和《中天竺国行记》是同书而异名）

关于王玄策的事迹两唐书中均有记载，其为唐初出使印度的使者，原籍洛阳，曾经作过融州黄水县（今广西罗城西北）县令。贞观十七年（公元643）二月随李义表送摩揭陀国使者还印度，经泥婆罗国，十二月抵其国，留印度两年。贞观二十一年（公元647）又以右卫率府长使衔出使印度，中途因摩揭陀国戒日王死，国中大乱，使队被帝那伏帝国阿罗那顺劫掠。玄策遂借吐蕃及泥婆罗等国兵大破之，擒阿罗那顺归长安。二十二年五月献俘阙下，拜朝散大夫。显庆二年（公元657）又第三次出使，送袈裟到印度，经泥婆罗国。显庆四年（公元659）曾到过婆罗门国，又到过迦毕试国。显庆五年（公元660）离印度。龙朔元年（公元661）春初返回长安。^[6]

从其经历来看，他两次去过泥婆罗国，自然的对其国的情况是十分的了解的，其所记的内容应该是其国的真实反映，可惜《中天竺国行记》在后代逸失，现在人们无法了解其书的详细内容，只能从其他文献中略窥其貌。

由上述可知，《旧唐书·西戎传》“泥婆罗国”中关于“水池”的文字记载应出自于王玄策所著的《中天竺国行记》。

二

现存文献中对“泥婆罗国”的情况最早作以系统详细记录是杜佑所撰的《通典·边防典·第六·西戎二》其文字记载为：

“泥婆罗国在吐蕃西，其俗翦发与眉齐，穿耳铛，揎竹桶缀至肩者以女姣丽。食用手，其器皆用铜。多商贾，少田作。以铜为钱，面文为人，背文为马，其牛鼻不穿孔。衣服以一幅蔽布身，数日盥漱。以板为屋，壁皆雕画。俗重博戏，颇解推测盈虚，兼通历术。事五天神，镌石为像，每日清水浴神，烹羊而祭。其王那陵提婆，身著真珠诸宝，耳垂金钩玉铛，佩宝装仗突，坐狮子床，常散花燃香。大臣及诸左右并坐于地。

有阿耆婆沱池，周围二千余步，以物投之，即生烟焰。悬釜而炊，须臾而熟。唐永徽二年遣使朝贡”^[7]

将《通典》所记内容和《旧唐书·西戎传》中所记作一比较，发现《通典》所记内容不如《旧唐书·西戎传》中所记详细。并且《通典》比之于《旧唐书》，其有所失记之文。如“宫中有七层之楼，覆以铜瓦，栏槛楹枅皆饰珠宝。楼之四角，各悬铜槽，下有金龙，激水上楼，注于槽中，从龙口而出，状若飞泉。那陵提婆之父，为其叔父所篡，那陵提婆逃难于外，吐蕃因而纳焉，克复其位，遂羁属吐蕃。

贞观中，卫尉丞李义表往使天竺，途经其国，那陵提婆见之，大喜，与义表同出观阿耆婆沱池。其后王玄策为天竺所掠，泥婆罗发骑与吐蕃共破天竺有功。”^[8]

这些文字资料是不见于《通典》的。可见，《旧唐书·西戎传》的史料并非是直接抄袭《通典·边防典·第六·西戎二》，其应该另有来源。

检阅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所编撰的全国地理类著作《太平寰宇记》，其对“尼婆罗国”的记载和《通典》所记，两者的文字记载是一样的，说明《太平寰宇记》的史料是直接抄袭《通典》的，或者两者是同出一史源。

继《通典》之后成书的断代体政书类著作《唐会要》对“泥

婆罗国”的记载也是十分详细的，其引文如下：

“泥婆罗在吐蕃之西乐陵川，土多赤铜，其俗翦与眉齐，穿耳，植以竹筒缓至肩者为妙丽。食用手，其器皆用铜。多商贾，少田作。铸铜为钱，面文为人，背文为马，牛不穿孔。衣服以一幅布蔽身，数日一盥浴。以板为屋，壁皆雕画。俗重博戏，颇解推测盈虚，兼通历术。祀天神，镌石为像，每日清水浴神，烹羊而祭。其王那陵提婆，身著真珠诸宝，垂纓耳金钩玉铛，佩服庄严。坐狮子座内，常散花燃香。大臣皆坐地不藉，左右持兵，数百人列侍。宫中有七重楼，覆以铜瓦，楹棋皆饰以珠宝，四隅置铜槽，下有金龙，口激水仰注槽中。

初，提婆之父为其叔所杀，提婆出奔，吐蕃纳之，遂臣吐蕃。贞观中，使者李义表使天竺，道其国，提婆大喜，延使者观阿耆婆沱池。池周围二十余丈，以物投之，则生烟焰，悬釜而炊，须臾可熟。二十一年，遣使献波娑浑提葱。

永徽二年，其王尸利那连陀罗遣使朝贡。”^[9]此段文字记载和《旧唐书·西戎传》中所记事实大段的符合，行文顺序也是很吻合的，但是和是在一些细节上还是有细微的差别。如：“泥婆罗在吐蕃之西乐陵川，土多赤铜”《旧唐书·西戎传》作：“泥婆罗国，在吐蕃西”，“铸铜为钱，面文为人，背文为马，牛不穿孔”《旧唐书·西戎传》作：“以铜为钱，面文为人，背文为马牛，不穿孔”等等。那么是否可以说明修《旧唐书》四裔传时的有关内容是承袭苏冕的《会要》、杨绍复《续会要》，还是北宋初年王溥修今本《唐会要》时承用了《旧唐书》四裔传。检阅《唐会要》“诸司应送使馆事例”条有：“祥瑞、（礼部每季见录送）天文祥异、（太史每季并所占候祥验同报）番国朝贡、（每使至鸿胪勘问土地风俗、衣服朝献、道里远近、并其主名字报）番夷入寇及来降、（表状、中书录状报、露布、兵部录部、军将见录陷破城堡、伤害吏人、掠虏畜产、并报）……”^[10]其记载可知，唐代建立了完善的史馆制度，每有重大事件的发生，这些事件都应该如实的记载，以供编纂当朝皇帝的实录和本国的国史。可见这些史料既非修撰者沿袭苏冕的《会要》、杨绍复《续会要》，也非北宋初年王溥修今本《唐会要》时承用了《旧唐书》四裔传，这两者的史料应该同出一源，及《高宗实录》或《国史》。由于现存有唐一代皇帝的实录基本上没有流传下来，因此上很难从史料对比的角度来确定其准确的史料来源，只能作这样简单的推测。

总之，关于“尼婆罗国”的记载情况，在现在传世的不同文献中，其在细节方面虽有不同的差别，但还是能够大概反映其国的概况，为今人了解和研究上古时期其国的概况提供了资料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（唐）玄奘口述、辩机著，季羡林等校注《大唐西域记》，中华书局1985年2月第1版，612页。
- [2]（后晋）刘昫等撰，《旧唐书·西戎传》卷198，列传148，中华书局1975年5月第2版，5289—5290页。
- [3]（唐）释道世撰，《法苑珠林》，上海涵芬楼影印明径山寺本。
- [4]（唐）释道世撰，《法苑珠林》，上海涵芬楼影印明径山寺本。
- [5]（唐）释道宣撰，范祥雍点校，《释迦方志》，中华书局2000年4月第1版，49—50页。
- [6]《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辑录》载范承均《王玄策事辑》一文，中华书局1957年。
- [7]（唐）杜佑撰，《通典》卷190，边防六，西戎二，中华书局1984年2月第1版，（据原商务印书馆《万有文库》之《十通》本重新影印）1204—1205页。
- [8]（后晋）刘昫等撰，《旧唐书·西戎传》卷198，列传148，中华书局1975年5月第2版，5289—5290页。
- [9]（北宋）王溥撰，《唐会要》卷100，中华书局1955年6月第1版，1788—1789页。
- [10]（北宋）王溥撰，《唐会要》卷63，中华书局1955年6月第1版，1089页。